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伊犁研究·文化篇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

Contemporary China Academic Library

光明日报出版社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伊犁研究·文化篇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

Contemporary China Academic Library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犁研究. 文化篇 /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12-7724-4

I. ①伊… II. ①伊… III. ①文化史—伊犁地区—文

集 IV. ①K294.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5840 号

伊犁研究. 文化篇

编 者: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 曹美娜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86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7724-4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伊犁研究》编委会

编者 赖洪波 曹丽虹
张建国 何苗苗
(排名不分先后)

《伊犁研究》序

在祖国西北边陲伊犁，坐落着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伊犁师范学院。该校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其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新疆省立伊犁专科学校。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该校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学院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为契机，大力实施“人才立校、特色兴校、科研强校”战略，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进入了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伊犁师范学院学报》是该校创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立足本院、面向全国，突出边疆、多民族、师范性特点。

“伊犁研究”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开设的一个特色专题栏目，迄今已10年。所刊发的论文涉及新疆伊犁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地域特点。承蒙专家学者厚爱和鼎力支持，专栏开辟10年来，发表了200余篇学术论文，对人们了解伊犁、认识伊犁的历史与现状发挥了重要的推介作用。有鉴于此，《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将该栏目的论文选编成《伊犁研究·史地篇》《伊犁研究·文化篇》出版，我认为意义重大。

伊犁地处祖国西北边疆，是我国西向通往中亚、西亚的大门，历史上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早在新石器时代，伊犁河谷即有不同种族的迁徙。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伊犁就和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公元前60年，汉朝建立西域都护府，伊犁和西域各地都纳入了中国中原王朝的管辖疆域。其后，历史上中国西部的诸多部落、部族和民族先后在这里繁衍生息、游牧狩猎、迁徙往返、交往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我国西部民族重要的荟萃区域。伊犁的历史文化一直与新疆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联、同步发展；同时，又与境外中亚的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伊犁地方独具特色的多

元历史文化。

“伊犁研究”是一个区域研究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外的区域研究理论已形成了独立的“区域学”，是将特定区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自然、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有人称之为是一个具体、复杂、多样的系统工程。“区域学”又可按不同的学科划分为区域地理学（特指的地理单元）、区域历史学（特指的历史时空）、区域经济学（特定的经济单元）、区域政治学（特定的施政地区）、区域社会学（具有相同社会属性的生活社区）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学者也开始重视区域理论的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理、气候、资源、人口、历史、文化等发展水平的差别颇大，特别是东西区域间的经济结构差异显著，资源类型多样，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研究区域发展条件、方法和途径等成为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重要课题。寻找不同区域历史与现状发展的特定环境与条件，研究不同区域历史与现状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探讨本地区历史发展的轨迹，把握本地区现阶段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最佳途径，是“区域学”研究的主旨。

开展伊犁研究，就是对伊犁的昨天和今天，包括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研究探讨，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分析伊犁区域的各种发展要素，把握本地区自然、人口、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梳理出一条区域发展的线索；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伊犁明天的展望，为伊犁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是一条艰巨长期的科学探索之路。

伊犁师范学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唯一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师范院校，在开展对伊犁区域研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相信，在各地各界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下，未来伊犁区域研究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区域学”研究的一朵艳丽的奇葩；《伊犁研究》（史地篇、文化篇）的出版是伊犁区域研究成果的检阅，该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和加快伊犁区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伊犁研究》（史地篇、文化篇）付梓在即，欣喜之余，特以为序。

厉声

2014年10月

••••• 目 录

人物篇

西北史地学背景下的徐松与邓廷桢、林则徐交谊	朱玉麒 / 3
乾隆帝伊犁诗文研究	周 轩 / 9
清代伊犁将军职主汇考	赖洪波 / 22
格琿额《伊江汇览》研究	鲁靖康 / 34
新土尔扈特蒙古亲王密什克栋固鲁布若干史事稽考 ... 白剑光	周学军 / 39
松筠“文化治边”思想及影响研究	郭院林 张 燕 / 46
谢彬笔下百年前的伊犁	吴孝成 / 56
曾问吾及其《中国经营西域史》研究	赖洪波 / 65
曾问吾生平事迹编年述略	崔保新 / 79
邓缵先文化援疆实践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以邓缵先修纂地方志为例	赖洪波 / 92
盛世才主政新疆时盛苏同盟关系的演变及原因探析	罗利新 / 101

文化篇

清代伊犁望河楼诗歌的历史文化考察	赖洪波 / 111
论伊犁河谷索墩布拉克文化	丁 杰 / 123

清代伊犁旗屯文化透视

——锡伯营旗屯文化个案研究 仲 高 / 140

日常书写与民间形态

——3~6世纪的吐鲁番民间书法 周珩帮 / 151

汉语维吾尔语中乌鸦文化内涵变迁之研究 ... 许多会 巴拉提·吐逊巴克 / 160

清末民国时期国家教育考试视野中的新疆关注 赵新华 / 168

古老史诗《玛纳斯》现代条件下传播特征研究 马惠敏 徐 梅 / 176

花儿学术视域中的新疆花儿试解 荆自勉 / 185

伊犁塔兰奇研究

伊犁塔兰奇社会历史文化概论 赖洪波 / 195

《塔兰奇史》评介 苗普生 / 218

“塔兰奇”名称研究述评 玉努斯江·艾力 / 228

述评及其他

一部维吾尔古文献研究的巅峰之作

——评耿世民著《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张建国 / 237

萧雄《西疆杂述诗》版本研究 李 宁 / 241

伊犁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姜新社 / 247

后 记 / 261

01

| 人 物 篇 |

西北史地学背景下的徐松与邓廷桢、林则徐交谊

朱玉麒

嘉庆十七年(1812)遣戍伊犁的清代学者徐松(1781~1848,字星伯),以其《西域水道记》为代表,成为西北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创始人^①。据与他同时而稍后流放伊犁的龙万育记载,《西域水道记》早在徐松嘉庆二十五年赐环回京之前,就已经写就初稿^②。然而,学术著作出版的艰难可谓古今一揆,遣戍归来的徐松虽然因为《新疆识略》的编纂而被起用为内阁中书,但二十多年的时间,却一直沉浮在位卑禄薄的京官任上。《西域水道记》这一名山之作在当时的刊刻付梓,如果不是“有力者”的资助,可谓遥遥无期。从道光三年龙万育的序言到道光十九年的最终印行,正是这样一种漫长的等待。这期间,龙万育这样著名的书商、李兆洛那样著名的学者,都曾经为该书的刻版印行做出努力,但最终还是由升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1775~1846,字嶠筠)毅然镂板自任,使《西域水道记》在道光以后风行天下。否则,不仅李兆洛感叹“冀及未死而见之”的愿望不能兑现,即使徐松本人,恐亦难以在生前看到《西域水道记》的付梓;他的《唐两京城坊考》、《唐登科记考》等传世名作,都是在身后才刻版

① 徐松遣戍伊犁期间的的生活,以及此后在京师的西北史地学研究,可参拙文《徐松遣戍伊犁时期的生活考述》,《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20页;《徐松与道光朝京师学坛的西北史地研究》,《西域文史》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65~294页。

②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嘉庆丁丑岁(二十二年,1817),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余方为逢书,而先后赐环归京师。”《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徐松著、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页。

印行,可为明证^①。

与徐松同时而稍晚的沈垚曾经多次感叹说:“黄梨洲先生言:学之盛衰,关乎师友。”邓廷桢为徐松的《西域水道记》镂板粤东,毫无疑问是西北历史地理学兴盛而“关乎师友”的一个重要明证。

一、徐松与邓廷桢早期的“同年”之谊

《西域水道记》的刊印,不能不论及徐松与邓廷桢的私谊。关于这一点,日本西域史的研究专家榎一雄也注意到邓廷桢在《西域水道记序》里称徐松为“同年”,但他错误地将“同年”一词理解为仅仅是同榜进士相称,所以既然邓廷桢在嘉庆六年、徐松在嘉庆十年先后中了进士,遂推测这里的“同年”只是因为二人在朝中成为编纂《全唐文》的同事,因而攀缘相称。这一理解其实是不准确的。“同年”一词原来是进士考试的同年登第者之互称,后来也有因攀附而泛称者,如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所论:

古人以同举为同岁,见于《后汉书·李固传》及《三国志·魏武帝纪》。其称同年则自唐始。唐宪宗尝问李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前明正、嘉以前,风俗犹为近古。……今世不论年谊有无,通谒概称年家,即屠酤儿亦然,最为无理,王新城《分甘馀话》中尝痛斥之。而今人名刺往来,若不署此二字,见者即疑为轻己,辄有拂然之色,亦可怪矣!

但这里邓、徐之间的“同年”称谓却并非这种世俗的攀缘,而是因为明清时代,乡试中举也成为士人科举道路上重要的环节,故同年中举同样可以称为“同年”。通过《邓尚书年谱》和《徐星伯先生事辑》,可以发现他们二人确实是嘉庆五年(1800)的恩科举人。因此,邓廷桢与徐松之间虽然没有同年考中进士,却还存在着同年乡试中试的科举事实。同时的严可均作《答徐星伯同年书》以及在《王仲堪墓志跋》称“同年徐翰林松购藏于家,拓数本赠予”,也是以嘉庆五年中举而称之为“同年”者。

基于这样一种乡试同年关系,邓、徐二人在先后中进士、授编修之后,又

① 《西域水道记》的撰述与刊刻过程,可参拙文《〈西域水道记〉稿本研究》,《文献》2004年第1期,第172~194页;《〈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荣新江、李孝聪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83~404页;《〈西域水道记〉刊刻年代再考》,《西域研究》2010年第3期,第76~81页。

曾有过同事相谐的岁月，因此非常投契。从同时人孙尔准（1770～1832）记载他们在编修《全唐文》时期的聚会诗作如《雨中偕邓嶠筠、徐星伯饮陈小孟寓》中，就不难体会这种同事的欢娱。而在邓氏的《双砚斋诗钞》中收录《喜徐星伯入关，以诗迓之二首》的作品，更可以分明地确认二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投戈瀚海竟归来，琴未全焦烛未灰。天要霜毫成地志，松湘浦相国欲作《新疆志》，适君至，遂以属焉。帝从雪窖老人才。七年磨蝎宫中坐，万里明驼塞上回。尚有书生豪气在，莫辞百罚覆深杯。

忆昔相将踏五云，文坛史局未离群。戊辰、己巳间，星伯提调文颖馆，余提调史馆，盖无日不偕也。玉堂转眼巢痕扫，尘海惊心驿路分。庚午夏，余既补外，星伯亦于是秋视学湖南。鸡肋一官空绊我，鸿泥双印又逢君。好将乐府刀镮信，报与南徐逐客闻。范川编修谪后，主讲海岳书院，近亦不得其音耗矣。

这两首诗作于嘉庆二十五年邓廷桢任西安知府而徐松遣成伊犁期满赐环时，对友朋绝域生还的喜悦，全从往昔“无日不偕”的回忆与痛饮深杯的豪情中体现了出来。

二、《西域水道记》印行的经世共识

此后的徐松回到京师，执掌文坛近三十年，成为西北历史地理学的领军人物，完成了《西域水道记》等一系列名山之作的撰述。而邓廷桢也官运亨通，从西安知府之后，先后担任湖北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安徽巡抚等职，并于道光十五年升任两广总督。正是由于这一同年“有力者”的资助，《西域水道记》这样的煌煌巨著才得以付梓印行。

邓廷桢在两广总督任上刊印《西域水道记》的动机，除了这一同年之谊，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和作者徐松一样，对《西域水道记》这一著作所具有的经世致用的现实和学术意义的卓见。邓廷桢《西域水道记序》提及出版该书的动机时说：

予于畴昔，自木天以载笔，喜访輿图；纂李唐之全文，勤搜志乘。虽功疲于掌录，固愿廛于胸罗。今者劳劳保赤，编筹海晏而不遑；勿勿汗青，烛炳公馀而姑待。宝书观成于我友，珍帚顿触乎初心。勉分校字之劳，重辱弁言之属。

輿图志乘的偏好，胸罗世界的执著，是邓廷桢的夙愿；因为海防的操劳使他不能完成早年的著述愿望，而徐松《西域水道记》的完成，正好促动了他的敝帚自珍的初衷。邓廷桢所以如此欣然地“勉分校字之劳，重辱弁言之属”，正是

由于徐松的著作完成了他们一代人共同的经世心愿。榎一雄根据邓廷桢《西域水道记序》的内容及其禁烟事迹，也曾对这一崇高的心期作出过高屋建瓴的结论：

正因为他（笔者按：指邓廷桢）作为两广总督深知与英国交涉和取缔鸦片的艰辛，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新疆社会的特异性以及对其统治的艰难，才能痛感详细准确地掌握有关这一地区知识的必要性。……徐松流放伊犁，趁受托编纂地志的机会，彻底展开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一定也是痛感到这种必要性的结果。而劝说作者拿出藏在书箱底十年以上的原稿，并将其刊行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一定是痛感这种必要性的一人。

对于道光年间有所作为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作出这样的理解，确实是深中肯綮而符合实际的。关于那一时代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论述，过去比较集中于林则徐、魏源这样的少数典型人物身上^①。而从《西域水道记》著述与刊刻的例证，包括该书众多的题词中反映出的经世精神^②，就可以发现，“放眼看世界”其实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群像。笔者也曾申论：“邓廷桢在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夜刊印西北边塞的地理书，除了邓、徐之间的个人交谊之外，更应关注的是知识界的精英对于来自西方挑战的预感。这种危机感的认识是全方位的，就遥远的海防前线刊印《西域水道记》一事，便可见他们——嘉道之际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同光之际发生‘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后来者。”

历史时常伏有先机。这一鸦片战争前夕刻印的《西域水道记》，也很快在战争发生后不久，便成为刻印者邓廷桢本人及其战友林则徐的行动指南，因为历史让他们在1840年及稍后的日子里重蹈徐松的覆辙——由于禁烟运动的正义行为，邓廷桢和林则徐先后被革职并充军伊犁。邓廷桢刻印《西域水道记》及其序言中表彰该书“补阙”、“实用”、“利涉”、“多文”、“辨物”的五善，都在他们的遣戍途中一一得以验证，这是邓廷桢人生的“书谶”！

① 即使是林则徐和魏源，他们的经世意识也多有从徐松著作和交往中互相砥砺所得者，参下文“徐松与林则徐”，及拙稿《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2009年11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待刊。

② 如徐松同年进士彭邦畴的题词开篇即言：“才不为世用，乃著经世书。”《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第15页。

三、徐、邓晚年的“同事”之情

无论如何，值得欣慰的是，徐松与邓廷桢的“同年”友谊持续了他们的一生。在徐松的晚年，曾于道光二十三年升任榆林知府，而此时流放归来的邓廷桢也于次年被起用为甘肃布政使，下年又升任陕西巡抚。相隔二十五年的宦海沉浮之后，晚年的两位老友再度在西安相逢。

经历西域遣戍的邓廷桢，晚年曾一再提及徐松在西域的萍踪，如道光二十四年升任甘肃平庆泾道的徐松同年进士魏襄，曾经写信给徐松，告知在经过兰州时与邓廷桢相晤的情景：

到甘省，晤嶢翁，虽彼此俱未见过，而同乡同年，且相好中俱之熟识而投契者多，故一见与故交无异。流连五日，无日不纵谈，亦无不谈及阁下。渠言口外所经历各庙宇，凡楹联之可诵者，皆出星伯之手。因背诵某处某处联句，历历不遗一字。

从以上的记载中，使我们得知徐松的文学才情在边塞的抒发，这在其文集散佚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可贵^①。

道光二十五年，徐松一度在榆林知府任上拂袖而去。身为巡抚的邓廷桢再一次伸出援臂，使他续职录用^②。次年三月，回任的徐松在临近潼关时，却未及与老友重逢，便听到了来自西安的邓廷桢的噩耗^③。

枯守着邓廷桢为他刻印的《西域水道记》，晚年的徐松仍然继续补正着这一名著，而将一张张笺条夹注其中，但似乎再也没有邓廷桢这样的挚友在其生前肯来关心《西域水道记校补》的印行。两年之后，他也相随邓廷桢遽归道山。由邓廷桢在两广总督任上镌刻的《西域水道记》木版，辗转流落到京师书肆本立堂；徐松自藏的一套《西域水道记》初印本及其亲笔修订的《西域水道记校

① 缪荃孙辑《星伯先生小集》，仅得徐松在巴里坤关帝庙一联，其云：“赫濯震天山，通万里车书，何处是张营岳垒；阴灵森秘殿，饱千秋风雪，此中有汉石唐碑。”《烟画东堂小品》，1920年缪氏刻本，第7册，第三叶正面。

② 道光二十六年（1846）刊本《陕西全省同官录》“徐松”条：“（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奉旨补授浙江嘉兴府知府，因回避原籍，奉旨调补陕西榆林府知府。二十五年五月，兼护延榆绥道。七月，因病开缺，旋即調理就痊，经抚台邓给咨送部，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著照例坐补原缺。二十四日，奉旨补授榆林府知府。”

③ 徐松道光二十六年《上穆鹤舫中堂书》：“松由河南前进，于三月廿三日行抵潼关，闻嶢翁之变，人人解体。”《星伯先生小集》，第十六叶正面。据《邓尚书年谱》记载：邓廷桢于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薨于陕西巡抚任，即此所谓“嶢翁之变”。

补》残卷,在半个世纪之后漂泊东瀛^①。

四、徐松与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与邓廷桢在虎门销烟和伊犁遣戍期间情同手足的交谊,是广为人知的历史佳话,毋庸赘言。邓廷桢与徐松围绕《西域水道记》的交友,如上所论,在西北历史地理学的背景中,也无疑可方驾鸦片战争中的林、邓之契。与邓廷桢齐名的林则徐,其与徐松的交谊似不如邓、徐二人密切。但是在林则徐遣戍伊犁的行囊中,便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在他道光二十五年往南疆勘地时,这部著作也被随身携带^②。《西域水道记》这一经得起实地验证的地理学著作无疑给遣戍途中的林则徐巨大的帮助和深刻的印象。

林则徐在邓廷桢之后从伊犁赐环,也在邓廷桢之后于道光二十六年七月继任陕西巡抚。这时候的徐松仍然在榆林知府任上。在徐松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林则徐对其吏治的才干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评语,在林则徐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1847年1月23日)上奏的密折中被保存下来。其中论及徐松的文字是:

榆林府知府徐松,年六十一岁,顺天进士。学优才练,率属严明,遇事矢勤,精力亦足以副之,似为通省知府之最。

毫无疑问,短暂的接触之后便使林则徐对徐松作出如此高的评价,此前《西域水道记》的印象恐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徐松后来迁任署理潼商道,虽然是在林则徐道光二十七年四月补授云贵总督之后的事,但此前林则徐的密折无疑是重要的基础。

《西域水道记》这部西北历史地理学的名著最终在道光十九年由两广总督邓廷桢刊刻印行,是与徐松、邓廷桢之间亲密的友谊有关,也与他们共同的经世意识有关。其后的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上给予徐松崇高的评价,与他在遣戍西域期间对《西域水道记》的深刻印象有关。围绕着《西域水道记》的著述、刊行与使用,徐松与邓廷桢、林则徐这三位先后遣戍伊犁文士的交谊,体现出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知识界深刻而清醒的危机意识和经世思想,也体现了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兴起和兴盛的重要人文因素。

① 参拙文《〈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第三部分“《西域水道记》校补本的流传与早稻田大学汉籍收藏”,第398~404页。

② 见林则徐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日《致赛什雅勒泰》,《林则徐全集》,同书编辑委员会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册,第30页。此承周轩先生检示。

乾隆帝伊犁诗文研究

周 轩

乾隆帝君临天下六十载，虽然终其一生未能亲履伊犁，但在他的心中，对距京城万里之外的伊犁应当是非常亲切和熟悉的，因为伊犁是他建立丰功伟业的地方，正是从伊犁开始，五年间历经曲折，最终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的叛乱，设立总统天山南北的伊犁将军，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达到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在战事紧张时，在批阅奏章时，在浏览舆图时，在规划治理时，他运筹于帷幄之中，心绪都曾一次次飞抵伊犁。除了发布大量谕旨外，还写了不少诗文（见于《乾隆御制诗文全集》），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论述。需要说明的是，与伊犁有关的，乾隆帝关于哈萨克的诗文，另文论述，笔者的《乾隆帝关于布鲁特的诗篇》和《乾隆帝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诗文》，分别见于《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和2012年第1期，恕不赘述。

一、曲折的两平准噶尔

乾隆帝冠名“伊犁”的第一首诗，应当是乾隆二十年（1755）的《西师底定伊犁捷音至，诗以述事》：“乘时命将定条支，天佑人归捷报驰。无战有征安绝域，壶浆箪食迎王师（大兵至伊犁，部众持羊酒迎犒者络绎载道，妇孺欢呼，如出水火，自出师以来，无血刃遗馘之劳，救边扫穴，实古所未有）。两朝缔构敢云继，百世宁绥有所思。好雨优霑土宇拓，敬心那为慰心移。”（《乾隆御制诗》二集卷五十七）

从乾隆十年（1745）起，准噶尔部贵族之间为争夺汗位进行了将近十年的残杀，内讧使经济凋敝，人心离散。在各部纷纷归附，阿睦尔撒纳等部落首领力请出兵讨伐的情况下，乾隆帝为了完成先辈两朝未竟之志，为了归顺部众的长远安置，力排众议，决定不失时机地平定准噶尔。二十年（1755）二月，清